

警惕道德還原論 和烏托邦主義的陷阱

Be Wary of the Traps of Moral Reductionism and Utopianism

劉月樹

Liu Yueshu

Abstract

Professor Xu Xiangdong's paper "Neuroessentialism and the Dilemmas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offers a systematic critique of both moral bioenhancement (MBE) and its underlying theory, neuroessentialism. A key insight of the paper is that the validity of an ethical theory hinges on the soundness of its underlying methodology. Neuroessentialism, grounded in reductionism, erroneously reduces human moral understanding and motivation to mere neural activities in the brain. Meanwhile, the MBE initiative, which seeks to improve moral behaviour through biomedical means, is a technologically premature and scientism-driven utopian endeavour that risks eroding human autonomy and the meaning of moral life. A further crucial implicat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bioethics researchers must steadfastly

劉月樹，天津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天津，郵編：301617。
Liu Yueshu, Professor,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China, 301617.

《中外醫學哲學》XXIII:2 (2025年)：頁 57–6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57–60.

preserve the field'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defend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徐向東教授的論文《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以深刻的哲學洞察和嚴謹的理論論證，對“道德生物增強”（MBE）以及神經本質主義理論進行了系統地批判。論文分析了上述理論在前提預設和實踐策略上的根本缺陷，指出了將人類的道德行為完全還原為神經生物機制的失誤和不可行性。

論文帶給我們重要啟示之一，是評判一種倫理學說的關鍵在於審視其致思方式的合理性。如果思想基石和論證方法存在根本缺陷，則整個理論學說便如築於流沙之上，註定會傾覆。神經本質主義立足於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還原論主張複雜的事物和現象可以分解為更基本的組成部分來進行理解和解釋。其特徵之一是基礎主義的，也就是希望找到不可再分的最基礎單元作為理解整個事物的基石；另一個特徵是決定論的，也即認為低層級事物對於高層級的事物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還原論有其合理性，簡化了人類認識過程的複雜性，因此成為科學發現的主要思維工具。然而，這一思維方式卻無法解決突現性、完整性、關係性以及某些事物的不可還原性等問題。

採取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導致了神經本質主義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如論文所指出的，神經本質主義的核心觀念是“一切關於‘我們’的東西，例如我們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我們的自我概念和人格同一性，都可以通過大腦的生物學來說明。”（徐向東 2025）這種將複雜的倫理現象還原為更基礎的和可量化的生物學事實，將人的道德理解和道德動機還原為大腦的神經活動的思維方式，導致了對於人類道德認知的具身性和生成性等特徵的理解缺如，“它根本上無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人類心靈本身是由大腦的神經系統、身體和環境構成的完整系統。”（徐向東 2025）故此不可避免地陷入謬誤之中。

除了神經本質主義的道德論證方式偏差，我們更要警惕道德生物增強理論所內涵的技術至上主義。道德生物增強理論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原始的道德稟賦和改進方式（如道德學習、教育和訓練）與人類未來應有的道德行為之間不再匹配，“這種‘不匹配’會使人類面臨所謂‘終極傷害’的威脅，即那種使得人類生活在地球上永遠不再值得過的災難性威脅，例如大規模種族屠殺、全球恐怖主義、全球貧困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徐向東 2025）對此，道德生物增強理論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利用生物醫學技術來改進人類的道德行為。這對很多人而言極具吸引力，因為其承諾了一種清晰和高效的問題解決路徑。道德生物增強理論將道德問題“醫學化”，也即將道德的“惡”視為一種有待修復的“神經功能障礙”，從而為解決道德問題的“技術化”方式留下了空間。

需要注意的是，道德生物增強理論沒有認真對待技術的可能性問題。生物醫學技術儘管在今天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離真正揭示人類的道德理解和道德動機的內在機制，以及提供有效的干預手段之間還有著很大的距離。更重要的問題在於，科學理論會出現範式轉換，技術方式也會不斷反覆運算，這就導致了今天認為是正確的做法，此後就可能變成謬誤。誰能為當下技術選擇的未來不利後果負責，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道德生物增強理論的根本目的，是要為人類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道德世界。但這實質上是一種烏托邦主義的想像。烏托邦主義許諾給人類美好的未來，但並不太關注實現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基礎，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人性自身對於美好生活所構成的障礙。在烏托邦主義的高度理性主義的框架中，沒有為人性中的欲望、自我中心和非理性意識等留下足夠的空間。無論是現實的歷史還是思想的歷史，都多次地重演這一過程：強行地改造人的“惡”，最終往往伴隨著巨大的人道災難。道德生物增強也是意在改造人

性，但其理性主義的設計思路，同樣忽視了人性的複雜性對於其技術路徑的阻礙。

在未來，即使人類擁有了改造道德行為的技術，在是否要採取這種技術手段的問題上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人類道德生活的意義維度、人的自主性和實踐的經驗性，都可能因為技術的改造而被消弭掉，從而將人從道德主體降格為生物客體，將倫理學拖回了決定論的窠臼。當科技失去了人文的平衡，“是”（神經機制）與“應當”（道德價值）被簡單嫁接，技術的潮流就可能將人類裹挾到不可知的危險境地。所有的問題解決方案必然製造出新的問題，所有矛盾的消失必然轉換為新的矛盾。寄希望一勞永逸地採用技術來解決道德的善惡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違背了世界的矛盾規律。

徐向東教授的論文帶給我們的另一個學理啟示，是生命倫理學應當如何進行理論論證。生命倫理學不應淪為科學理論的“應聲蟲”和技術實踐的“售後服務”，而是必須堅守其哲學思維的本性，包括對關鍵概念的澄清，對理論預設的反思，對論證鏈條的審視，而核心是對人性尊嚴的堅守。生命倫理學不應只是給出“可以”或“不可以”的簡單答案，而是要深入倫理理念和技術邏輯的底層，通過嚴謹的論證去揭示問題的複雜性和實踐的可能性。生命倫理學者需要對世界的規律做出真正的理解，如此才能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避免製造出新的謬誤。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徐向東：〈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7-34。Xu, Xiangdong. 2025. “Neuroessentialism and the Dilemma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7-34.